

59

王健 译

B948
C61

〔日〕池田大作 著

佛法·西契東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年·成都

前 言

进入20世纪，地球的确变小了。科学技术的发达，使得物资、信息、人员在十几个小时内，就可以从最东边的日本传送到欧洲。如果运用电波传递信息，更是瞬间便可以完成。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物理空间的缩短并没有使人类的心灵连在一起。

当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物理距离的缩短已经把世界联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事实。但是，现实却是人们虽然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然而心灵的交流却竟然是那样贫乏，憎恶、嫉妒、对抗和战争接连不断，这难道不是人类的悲哀吗？

造成人类心灵距离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相克、人道主义和权威主义思想方法的不同等等。但是，还应该看到，所有这些矛盾也与东方和西方各自的观念、文化的不同有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及地

理环境下，东、西方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文化。在历史上，东、西方诸多的交流、接触和抗争都与这种文化背景有关。

人类不会停留在已经过去的历史上。我认为，东方与西方进行真诚的对话与交流，就是适合一个“命运共同体”、建筑一个世界的最富有成效的行动。这也是人类未来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很久以前，我就对东方与西方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问题非常关心，其原因如前所述。多年来，我与西方的有识之士进行了多次认真的对话，目的就是想探索面向21世纪的人类的前进的方向。

与卡雷尔基伯的对话，题目为《文明·西与东》；与汤因比博士的对话，以《展望21世纪》为主题。在与各位专家对话时，我始终以坚信佛法的宗教家的立场来谈论自己的看法。不过，我是把它放在更广大的社会视野中来思考的。通过与西方学者的一系列的对话，我越来越坚信：经过东、西文化的交流来连结人类之心灵是当务之急。

在世界上建筑一条“精神的丝绸之路”，这是我的一贯论点。丝绸之路曾经是连结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干道。每当想起它，我都不能不感叹人类的伟大。人类能够攀登重重险峰，越过浩瀚沙漠，就能开拓文化交流的大路。我以为，这个交流的中心是佛教。

作为一名佛学家，建筑“精神的丝绸之路”是我的愿望。这个愿望必然使我关注往来于古代丝绸之路的佛教，以及它对世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这就是我写作本书《佛法·西与

东》的目的。

所谓“佛法”，即佛教的底蕴，亦即沉潜在佛教深层的贯彻始终的普遍性的法理。从这个视角来理解佛教，就能够找到佛教不同派别以及它向东传播（中国、日本、东南亚）形成佛教文化圈的渊源。

亚洲人民肯定能够通过各个不同的流派接触到普遍性的佛法，也能认识到普遍性佛法中的宽容性和世界性。

通过本书，我至少想说明一个问题：佛法的世界性和宽容性必然使它能够西渐，并对西方人的生活和思想产生极大影响。当然，与东渐相比，佛教西渐的研究还有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开拓这个领域。我不顾条件的不足，编纂了这本书，所以肯定只能涉及一些西方本土上的佛教痕迹，这是我从一开始就预感到了的。

池田大作

1976年4月2日

东方与西方之间

对东西方世界融合的期望

当我们在思考东与西，或东方与西方这两个文化圈相互融合的问题时，两个诗人的名字会首先浮现在我们脑海里。他们是拉德亚德·吉普林^①和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②。吉普林在他的诗作《东与西》中写道：“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它们永远不能相聚。就像天空与大地，永远处在伟大的神为它们安排的位置上。”泰戈尔在《东方与西方》的论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① 拉德亚德·吉普林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生于印度孟买。曾作为新闻记者活跃于印度各地，后以印度生活为题材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代表作为《热带丛林·布谷鸟》。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印度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曾留学欧洲。1921年在桑地尼克丹创办国际大学。用孟加拉文写作，一生创作丰富。代表作品有诗集《金色的船》、《飞鸟集》、《园丁集》等。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人就是人，机械就是机械，这二者也许永远无法融合。”

很显然，泰戈尔是把“精神”作为东方的特征，把“物质”作为西方的特征来谈论这个问题的。

这两位诗人对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既怀着深深的忧虑，又抱着热切的期望。他们以特有的敏锐来观察和思考20世纪初的世界形势，并提出了其深刻的见解。

吉普林暗示了这样一个思想，即消除东西方世界的对立或隔膜，就要使双方各自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强大起来。他说：“如果是两个强者相对，那么东方或西方、地理环境、能力个性、成长背景的差异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泰戈尔曾在一篇论文中谈到东西方文化的互补问题。他认为：“东西方文化在生命过程的深层理解上是可以沟通的。比如东方人关于无限和永恒的神秘意识，就可以满足西方人希冀获得心灵安宁的精神需求。而西方人所创造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也使东方人得到了物质方面的帮助。”很显然，泰戈尔是希望通过相互补充以及深刻的理解和信赖，使东西方融为“一个世界”。

如今，20世纪70年代已经过去了一半。在西方所产生的科学技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从物质的层面来说，东西方的确是“一个世界”。飞机、电视、通信等

现代化手段把世界各国、各民族连为一体，在这个意义上，泰戈尔所说的“科学是使人类富有的优秀赠品”一语，确实是非常正确的。

然而，就世界目前的现状来看，“富有”并不是科学赠给人类的唯一礼品，它似乎还带给我们某种时代的危机感。近来有学者指出，科学技术在使用不当时，也会带来弊端。比如它在物质文明上把世界连为体的同时，也把公害变为世界性的。全球性的危机、核武器的威胁就是这方面的证明。

西方科学所建造的“全球一体”的物质世界，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消极作用。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是由于精神世界的贫乏。换句话说，在物质世界充分优裕的时候，没有构筑一个丰富健康的精神世界。这也许是现代人面临的最大问题。

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并不能肯定人类今后会永远杜绝战争；相反，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以及猜疑仍然存在。为了克服这种状况，探寻一条沟通人类精神走向的共同道路，在今天也许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需要。

面临即将到来的21世纪，我们应该从那些细枝末节的争论中解放出来；在时间上，从世界史的观点，在空间上，以全人类的视野，来思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探寻人类的共同的精神之路。我认为，“生命”就可以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视野。有的学者把地球作为共同体，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美国经济学家K. E. 鲍尔丁古^①也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提出了“地球号宇宙船”的概念。他们的观点现在已经普遍被人们接受。从佛法的立场看，消除人种、民族差别的观念之基础是“空”，而“空”是建立在对“生命”的正确理解之上的。换句话说，“人”应该是世界的人。

论述至此，我想起印度总统拉达克利希南^②的话。拉达克利希南于1962年就任印度总统，他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物。可以这样说，他履行的是柏拉图式的哲人政治^③。

拉达克利希南在他所著的《东方宗教和西方思想》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这个星球上的居民，最初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和其他部分的命运连在一起。这既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

① K. E. 鲍尔丁古（1910— ），美国经济学家。其研究涉及理论经济学、社会系统以及尚有争议的理论问题等诸多领域。

② 拉达克利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 1888—1975），印度哲学家、政治家。生于南印度。毕业于马德拉斯基督教大学。历任印度各大学哲学教授。牛津大学第一位亚裔教授。著有《印度哲学》（两卷），此书成为学习印度哲学最有价值的参考书。1962年任印度总统。

③ “哲人政治”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主要学说。其观点认为，只有哲学家担任国家的管理者才能建立理想国，即把哲学和政治的统一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

应该是人类命运的归宿。科学和技术尽管不能把它作为目标，然而却有可能为它的实现提供条件。现在我们面临的政治和经济的各种现象表明，把世界作为一个单位，据以处理各种事情已经成为急待研究的课题。贸易一体化，商业国际化，政治命运相互依存。然而，人类形成共同体的观念目前还很不稳固，它不过是我们的美好愿望罢了。建立人类共同的公民权以及责任义务的理想没有被普遍地接受，更不要说急切地实践它了。”

这个发言约在35年前，大约是1939年。与那个时代相比，今天的人类都在哪些方面进步了呢？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尽管人们投入了满腔的热诚和辛劳的努力，然而走向“一个世界”的步伐仍然十分缓慢。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气馁，相反，倒应该树立起坚定的信念：无论如何，世界都是在前进的。在这样的信念之下，我们就会锐意开发人类的精神文化，找到一条通往世界大同的精神之路。

“东方”和“西方”的概念

当我们从世界史和全人类的视野来考察人类文化产生以来的历史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

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人类本来就是作为“一个世界”而联结在一起的；所谓西与东、西方与东方的划分，不过是为了语言概念的方便而已。

现在我们习惯使用的“东方”与“西方”的概念，其实是非常暧昧模糊的。“东方”与“西方”最初称为“东洋”与“西洋”，从地理上来说，那个“洋”究竟是指哪个“海”？这是很不清楚的。

在人们模糊的意识中，东方与西方没有严格的地理区分，人们只是根据久已习惯的感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为了进一步讨论问题，我们很有必要首先明确一下“东”与“西”的概念。

“东方”与“西方”，或“东洋”与“西洋”的名称，原本起源于中国，它与海有直接的关系。

从汉朝开始，中国人与西方文明世界的联系，就通过海上交通发展起来。那时与西方往来的地区主要是沿海大陆地区，即印度支那半岛的南端，到印度的南端。也就是说，那时中国人的西方概念，主要是指这些地区。12世纪的下半叶，即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居住在现在菲律宾的米沙鄢人进入中国大陆的南部沿海，以此为契机，中国人也通过台湾海峡到达了菲律宾，进而又发现了连接婆罗洲、苏门答腊岛和南方的香料群岛的航道。

一般认为，元朝汪大渊所写的《岛夷誌略》^①最早记述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两条南海航路。

在这两条航路中，最初沿大陆海岸线、向西边往来的航路被称为“西洋针路”；新开辟的、直达太平洋的航路被称为“东洋针路”。这是最早产生的“东洋”和“西洋”的概念。

因此，从最初使用的概念来划分，今天的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相当于“西洋”；以此为参照，处在东面的菲律宾相当于“东洋”。

到近代，欧洲人通过印度洋来到中国之后，他们把本国国土称为“西洋”，因此也就自然地将日本地区称为“东洋”。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本身却没有被归入任何一方。

以上我们已经叙述了“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来源于中国的前后经过，下面还想进一步探讨中国文化对日本的长期影响的问题。

在日本，最早提出“东方”与“西方”文化比较的，是幕府末期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②，他提出了有名

^① 《岛夷誌略》，中国元朝汪大渊著。汪为江西南昌人，字焕章。曾随商船历访98个国家，将记载各国地理、物产的札记集为《岛夷誌略》一书。

^② 佐久间象山（1811—1864），江户时代末期的思想家。年轻时钻研阳明学和朱子学，在江户开办私塾，其弟子有胜海舟、坂本竜马、吉田松陰。其思想主张为“东方道德，西方技术”，试图将西方科学技术与阳明学和朱子学相结合。

的口号：“东方道德、西方艺术”。佐久间象山把艺术亦即技术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把道德亦即精神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他的目的在于将二者统一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出，至少在幕府的末期，“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就在日本出现了；用“西方”特指欧洲，此与近代以后的中国所指大致相同；但是所谓“东方”，则意味着拥有儒教文化的中国和日本。就日本人来说，尽管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包含在“东方”的范围内，但是却与中国的概念不同。

新井白石^① 写有《西洋纪闻》一书。

这本书是对1708年突破禁令来到日本的传教士西特奇的访问记录。其中所使用的“西方”概念已经具有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含义，而与以海洋划分东、西方的概念大不相同。

正如许多人知道的那样，日本人和欧洲人的接触，开始于战国时代，那时日本人把他们或称为“南蛮人”，或称为“西洋人”。因此，在日本人的观念里，所谓“西方”从最初就明确为欧洲人和欧洲文化。

与“西方”概念相比，“东方”的概念则出现较晚。

^① 新井白石（1657—1725），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家学者、政治家。出身于身份较低的武士家庭，在穷困中刻苦求学，曾随木下顺庵学习朱子学。后在六代将军家宣、七代将军家继门下担任幕政，推行正德之治、武家诸法度改订、货币改革等文治政治。著有《西洋纪闻》等著作。

日本人最初的东、西方概念与现在人们含混使用的东—西图式大致相同。

但是在“东方”的概念中，没有包括佛教的发祥地印度。

现在使用的“东方”概念，或多或少受到近代以来以武力为背景的欧洲近代文化冲击的影响。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或日本，尽管程度不同，然而在受到近代欧洲文明的洗礼这一点上是一样的。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泰戈尔的“人就是人，机械就是机械”的话语，其中就暗示着西方所带来的机械技术文明的强烈冲击。

把这种“西方”、“东方”的概念与这两个词汇刚出现时相比较，尽管文字相同，然而其中的内涵却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了很大变化。按照最初的字面意义，“东洋”、“西洋”都与海洋有很大关系，以后逐渐脱离了海洋的内涵；到近代以后，代表科学、技术、机械的“西方”对整个“东方”造成压迫，因此，“东”、“西”方的概念就具有了文明和文化的含义。这些含义在现代已被人们认同了。

但是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即我们把“东—西”、East—West 或Orient—occident 翻译成日语时，是否能准确表达东方—西方的含义呢？

在欧洲，东—西概念的出现是相当早的。

在希腊语中，Anatole 包含着上升的意思，指太阳升起的地方，从希腊所处的方位看，其所指就相当于东方的那些国家。这与“亚细亚”的概念具有同样的内含。所谓“太阳升起的地方”，最初指包括埃及在内的地中海东岸，以后逐步扩大为东方的全部地域。与“Anatole”相对应的地方被称为“Europe”。希腊语中的“Anatole”在拉丁语中被称为“Oriri”；以后又演化为“Oriens”；英语、德语和法语中的“Orient”就是从“Oriens”中产生出来的。与此相对照，“Occident”具有“沉下去”的意思。

由此看来，欧洲的东—西概念与海没有关系。仅此一点，我们把东与西翻译为“东洋”和“西洋”，或多或少有些不确切。

然而，在三枝充惠教授的《东洋思想和西洋思想》中，东、西方就是以陆地明确来划分的。三枝教授用德语的“Morgenland”（朝阳的陆地）描述东方，用“Abendland”（夕阳的陆地）描述西方。而特指东

方地域的“Morgerland”最初是由马丁·路德^①从希腊语的“Anatole”转译成德语的。总之，它具有德意志民族那种思辨性和逻辑性的特点。

东方—西方，是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语言。本来，在西方人那里，它是分别指太阳升起和下落的地方；而在东方人那里，它不过泛指中国南海航路的东边部分和西边部分，并没有严格的意义划分。

把世界一分为二，对西方—东方作出实体性的区分，并且加入明确的对立意识和价值观，这起因于近代欧洲的科学技术文明对东方的冲击和影响。对此，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历史现象就可以知晓。当然，我们也不能断然地说，近代以前就完全没有东—西的对立意识。

就欧洲来说，把自己的地域视为“一个整体”的意识和情感比东方人强得多。最古老的例子可见于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腊人希罗多德^②所著的《历

^①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是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在德意志社会各阶层对罗马教廷强烈不满的情况下，他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其神学思想强调因信称义，认为人要获得上帝的拯救不在于遵守教会规条，而在于个人的信仰。遗著有《席间漫谈》、《书信集》、《讲道集》等。

^② 希罗多德 (Herodotos, 前484—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曾到东方各地旅行，在对东方广泛了解的基础上，写出历史名著《历史》中。本书探讨了希腊和亚细亚的对立抗争的原因并记叙了波斯战争的过程。希罗多德被称为“历史之父”。

史》。

名著《历史》，以波斯战争为主题而展开。它的主要思想是表现希腊文化和以波斯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之间的强烈对立意识。换句话说，相对于希腊城邦的民主政体，波斯是专制的政治体制，是非常野蛮的国家。这种观点在历史上一直发生着影响，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西方比东方优越的差别感。

在欧洲，制造东—西对立图式的鼻祖是希罗多德。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匈奴人^①和蒙古人对欧洲的入侵，欧洲人更加感觉到东方异族的威胁，后来与东方伊斯兰教徒的对立也越来越尖锐，从而信仰基督教地区，也即欧洲的这种对立意识也就变得更加牢固。

关于“生命”的普遍性观点

如前所述：严格说来，东与西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界说；而只是在粗略的地理、空间区分的基础上，加入了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内容；总之，它是极富弹性的动态性概念。

^① 匈奴人(Hun)，属土耳其系统的游牧民族。以中亚细亚草原为居住地。公元4世纪前后向欧洲迁移，并引发了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到5世纪时其力量开始衰落，随着与其他民族的逐渐融合而消亡。

因此，近代以后的东—西对立也只是相对的基准，并不能完全按照这个图式去理解生动的历史和现实。换句话说，如果说我们把东—西的概念放在它所产生的历史过程中去思考，是面对过去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就应该面向21世纪的未来，寻找思考东—西问题的新基准和新视角。

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所谓“东与西”的概念，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在现代，其内容也未必明确，只不过是作为符号化的概念而通用着。

既然是符号，那么就不能说是完全不必要的概念，而且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和国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符号，理解自己，完成国际性的任务。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从现代和未来的视角，而且站在普遍性的“生命”观点的立场上，那么东与西、东方与西方的区分和对立也不过是共同基础上的分歧。更进一步说，东方和西方虽然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但经过正确的扬弃，就有可能创造出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并且朝气蓬勃的文化来。

在历史上有很多异质文化经过相互接触而产生新的创造力的例子。

生活在地球这颗行星之上的人类有着共同的命运，即都有生有死。然而就文化的特性来说，所有的